

# 社会科学中的实践论

王晓毅<sup>1,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实践论主张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 但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科学追求规范化的过程中逐渐丢失, 导致教条主义和快餐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盛行。实践论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建设需要通过深入和广泛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 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议题, 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快餐式的研究。

[关键词] 实践论; 社会科学研究; 环境社会学; 人与环境;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21)04-0065-05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实践理论的考量在国内也得到回应, 先有黄宗智先生对中国社会科学从实践出发的教诲<sup>[1]</sup>, 现有范叶超博士希望将实践的研究脉络引入环境社会学的思考。注重从实践中归纳和总结理论, 不仅使社会科学能够从社会现实中获得新的发现, 而且更有利于学术研究对社会作出贡献, 更深一步来说, 也有助于本土的社会科学发展。实践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汇,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政治话语或学术研究中, 实践被赋予了不同的丰富的意义, 因此, 什么是社会科学中的实践? 为什么当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强调实践? 也许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实践论的两次讨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有两个关于实践的重要文献, 是我们在谈实践论的时候无法绕开的, 第一个文献是毛泽东同志在 1937 年发表的《实践论》, 在这部著作中, 毛泽东同志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 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sup>[2]</sup>。第二个文献是 1978 年《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强调指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而且是唯一的标准”<sup>[3]</sup>。

之所以说在讨论实践论时, 这两个文献是无法绕过去的, 是因为这两个文献在政治和理论两

[收稿日期] 2021-04-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社会实践论的形成、发展及应用研究”(19CSH001)

[作者简介] 王晓毅(1961—),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刚刚完成长征不久,要实现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战争就需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避免被共产国际左右。因此实践论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不仅因为教条主义者只会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这些教条主义去吓唬别人。说到底,在用实践论反对教条主义的背后是对话语权进而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目的也是要破除在“文革”中形成的教条主义。因此,这两次关于实践的争论看起来是在哲学层面的争论,其深层是现实中话语权和道路之争。

在这两次关于实践的讨论中,实践带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即经验性、社会性、过程性和目的性。所谓经验性的实践与抽象的、教条主义的理论相对应,实践是在经验层面的,或者说是客观的。首先,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实践是指人所参与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这不仅包括了日常的生产领域,也包括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无从认识社会,进而可以说,如果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以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其失败就是必然的。经验性为中国共产党摆脱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的社会性。实践并非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社会实践表明,实践是在社会中进行的,离开了社会就无从讨论实践。所有的实践活动,不管是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生活,都是在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完成的,因此实践不是单独的个体行为,单独的个体行为既没有可能发生,也没有实践的意义。再次,实践是一个观察、总结和行动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从而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提升。实践不等于简单的经验描述,而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论,实践论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理论的建构,甚至也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解决现实的问题是实践的最终目的。解决现实问题既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实践的一个环节,当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世界以后,形成了知识,这些知识要被用于改造实践、解决社会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

在认识论中有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那么实践论更接近于归纳推理,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而不是通过概念的逻辑演绎而获得理论,这种方法论与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任何理论都是要通过经验的验证,理论不能进行自我验证。但是如何提出命题或理论,实践论与被我们称为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有所不同,在实践论中往往不是先有一个理论假设进行验证,而是在总结大量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无论中国的革命或改革开放,都是一种全新的经验,是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论为中国经验提供了理论基础。

## 二、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实践论

中国共产党对实践论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实践论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对实践论的讨论不多,但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在黄宗智看来,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是典型的从实践出发,他自己的研究也是从实践出发的。与孙立平对制度的强调不同,黄宗智指出他自己所说的实践是相对于理论和表述,是长时期的历史变迁<sup>[1]</sup>。要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去分析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素材,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

如果我们以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为例,可以看到在社会学的传统中,经验性、社会

性、过程性和目的性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即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需要社会学的参与,因此社会学从恢复之初就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决策参考倾向<sup>①</sup>。为了提供决策参考,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社会学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回答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费孝通所倡导的社会研究方法把社会学者带入社会调查中,以大量细致的调查构建了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不论是学生的训练作业还是研究者发表的论文,多数是基于经验研究。我们如果清点一下过去40年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主要议题,会发现大部分议题都是从现实的社会问题出发,并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逐渐从现实议题转化为学术议题,带有强烈使命感和目的性的社会学研究无法脱离实践。

如果说实践是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传统,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又要重新讨论如何将实践引入社会科学分析,通过实践论来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重视实践不应该是西方学术传统的简单回应。黄宗智先生的文章和范叶超博士的文章都引述了西方学界有关实践论的讨论,认为实践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概念或视角,在西方的知识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中国学界关注实践的理由。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流派是复杂多变的,所提出的理论也多种多样,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并不能成为中国学界追随的理由。其次,实践论的作用也不应该是消除理论与经验的对立<sup>②</sup>。理论与经验并不必然存在对立关系,理论的概括不仅来源于经验,而且也对经验研究发挥指导作用。用宏大的理论替代从经验出发的研究,将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建立在某种特定的理论上,罔顾社会现实,这并非是理论的错误,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路径或学风出现问题。

笔者认为,基于实践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社会科学追求规范化的过程中其实践的传统在丢失。随着社会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快餐式研究开始蔓延,使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成为一种游戏。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从理论到方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学者以透过西方理论的镜头来观察中国现实,将中国现实社会简单化和概念化。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中通用的一些概念,大多来自西方,因此研究成果能否与西方的理论对话,或者能否用中国的经验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就成为科研成果水平的标志,而学术期刊的导向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与对西方学术传统的尊崇相对应,持之以恒地对西方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批判也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在本土化的话语下,不对中国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具体分析,仅挑选出一些零碎的事实来证实西方理论的适不适用。当社会科学成为一种理念或者一种产品,在学术研究中就很容易丢失实践。

<sup>①</sup>李友梅对中国社会学恢复的回顾也表明了中国社会学面向社会发展需求的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凸显国家建设与发展对社会学的呼唤,使中国社会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推动了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进程中的诸多特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开展诸多扎实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费孝通的‘小城镇发展研究’、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现状、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参见:李友梅.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N].人民日报,2018-09-10(16)。

<sup>②</sup>经验研究不等于经验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教条主义并非是西方或非西方的理论,也不是宏大或微观的解释,而是观点先行,对社会事实按照观点进行剪裁,而观点的产生又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色彩,执着于西方的理论或非西方的理论,缺少对社会复杂事实的关注。

教条主义也得到了快餐式学术研究的支持。不管是社会的结构还是社会的过程,都是复杂的,只有置身于其中才能真正理解,但是在文章发表、职称评定和课题结项等多重压力下,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快餐式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推导出一些命题,对社会事实进行快速的采集和切割以验证命题,产生一些逻辑严密的快餐成果。这种快餐式成果从形式上看似乎是经验研究,但实际上是用理论切割事实,被切割的社会事实无法真正验证命题,更不能基于经验产生新的知识。

例如,社会调查是经验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在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却存在两种不同取向。一种取向是先有命题,围绕这个命题进行数据收集,通过所收集的数据验证或推翻原有的研究假设;另一种取向是在进行社会调查之前并没有清晰的假设,而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而逐渐抽象出命题或理论,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sup>[2]</sup>。从方法论上来看,两种取向都是科学的,但是实际结果却会产生差异,第一种取向更便于与已有的研究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知识的链条,而第二种取向是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更多新的发现产生,但是这些新的发现往往并不在原有知识的链条上。在文章发表的压力下,一些学者对上述两种研究方法都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在第一种方式下,采集数据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忽视复杂的社会事实;在第二种方式下,有意忽视与结论相反的社会事实。

正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存在教条主义和快餐式研究的现象,所以重提实践论,强调从经验出发,在复杂的社会事实中建立社会科学的解释和命题,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环境社会学如何实践

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相似,环境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环境问题,由于环境恶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应运而生。但是与一般社会学不同,首先,从全球来看,环境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美国也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产生<sup>[4]</sup>。在社会学恢复之前,中国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并没有环境社会学,所以环境社会学是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而逐渐产生的,在理论上或研究方法上都尚处于探索时期。其次,社会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环境社会学不仅仅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要研究人与物即人与环境的关系。新兴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环境社会学,面临着许多新的研究议题,这些议题需要从现实中产生。

第一,人与环境的关系尚未得到系统的梳理。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将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看作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原因。当前,中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发展带来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因此,消费主义、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经常成为环境社会学批评的对象。但是单一的对现代化的批评并不能改变现代化的进程,因此需要在经验层面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人与环境如何实现协调的发展。大量的宏大叙事可能解释中国

环境的许多问题,但是却无法提供一个替代的方案。回到复杂的社会事实中,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现代化的生产和消费之外,人与环境还有新的关系产生。

第二,国家主导的环境治理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国家之外的力量缺少系统的考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环境问题迅速积累,强大的国家力量介入解决了许多紧迫的问题,但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单一政策在解决一个环境问题的時候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除了有效的环境政策和行政执行能力外,长期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人与环境相协调的关系,这应该是生态文明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社会学不仅需要反思宏观的环境政策,而且还要关注人们日常的生活,从日常生活出发,形成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积累。

第三,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要特别注意避免快餐式的研究。环境社会学与政策的密切联系,对不同利益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会导致一些环境社会学议题的敏感;同时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对实践本身的误读经常发生,从实践出发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一方面缺少深入和多角度的实践就不能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深入和多角度的经验研究面临许多困难,这就需要环境社会学研究者能够有更明确的意识,避免简单的快餐式研究。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建设需要通过深入和广泛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论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实践论并不应该排斥理论,而是应该在研究议题的设立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更加强调从实践出发。

#### [参 考 文 献]

- [1]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83-93.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N].光明日报,1978-05-11(01).
- [4]REDCLIFT M, WOODGATE G. New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5.

[责任编辑 章 诚]

**Understanding Endogeneity: A Study on Practice Theory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FAN Yechao

**Abstract:** Nowadays, the endogenous dimension of China'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mainstream moder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has exposed obvious limitation in its insufficient study in this regard. The shift of attention to daily life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remind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ooted in daily life and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daily life. As a theory of daily life, theory of practice emerging in the western social theoretical field advocates interpreting social life and social phenomena based on daily practice,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idea of exploration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ral daily lif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but also casts light on the current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the effective explanation of moder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e theory can make up for its theoretical insu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rural environmental change.

**Practice Theories in Social Sciences**

WANG Xiaoyi

**Abstract:** Practice theories advocat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practice, but this excellent tradition has gradually been discarded in the pursuit of normativity i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ulting in the prevalence of dogmatic and "fast-foo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actice theorie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through in-depth and extensive empirical studies, and focusing more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rooted in people's everyday life, while avoiding "fast-food" studies in particular.

**The Perceptual Dimension of Social Practice Theories**

LU Chuntian

**Abstract:** Practice theories, emerging in Wester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dvocates to explain the society-environment interaction through the materiality of practices, and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everyday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a clear explanatory shortcoming in practice theories in terms of the long-standing disparity between everyday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with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order to bring back the role of perceptions in triggering changes in everyday practices, researchers should choose a considerate length of time as the unit of observ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everyday practices, and include regional specificities while analyzing changes.

**Impact of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Market Respons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LI Yan, YU Yang, GONG Dawei, WANG Xintia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ose in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bear greater pressure o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y role of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market respons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inspectors transmitting the information of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costs to the market. This study takes enterprises in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as sample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the investment market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re is an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enterprise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investors, and the correc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untervailing the market distortion is germinating. The investment market has different responses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he CAR rat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information, and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unleas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 we must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NG Jiafeng, BI Miao

**Abstract:** 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of 11 provinces and 11 municipa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from 2010 to 2017 with the random-effects model,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D investment, opening-up level and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R&D invest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while the level of openness and patent accepta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it. Therefore,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must strength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ase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must strengthen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the entire river basi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entire river basin, so a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area.

**Research on Driving Factor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ree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oot Cause Analysis: Th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

REN Xiangwei, SUN Liwen, XING Liyun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most scholar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ining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 but ignore the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ir importance, which leads to limited reference and guidance to the practi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study adopts root cause analysis, collects data from typical cases and some documents, mines 80% of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ith affinity diagrams, fish bone diagrams and Pareto analysis, and combines and sequenc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orders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ource elements, environmental elements,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ideological change, expected income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driv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can be further summarized into factor-driven category, behavior-driven category and goal-oriented categor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and ad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In general, the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enterpris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well.